

19 世纪拉美天主教与美国新教

——社会阻力与动力的象征

刘文龙

主要观点 作为欧洲封建制度基本组成部分的天主教移植到拉美后, 成为享有政治特权和巨额财富的国教。天主教会与世俗政权结成联盟, 共同维护教会和世俗政权的专制统治, 成为阻碍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最大障碍之一。主张社会变革的自由派与教会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斗争。新教的伦理道德观是塑造美利坚民族勤勉、进取和奋斗的民族特性的重要精神因素。新教各派通过宗教奋兴运动和社会变革, 对美国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社会、不断完善的民主政治和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柱。近代美国新教作为社会变革的精神动力, 与阻碍社会变革的拉美天主教形成了强烈对照。它们在教义理论和实践上的差异及其不同社会作用, 是造成二者社会经济差别日益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 天主教 自由派 新教 奋兴运动

作者 复旦大学历史系拉美研究室教授 (上海 200433)

在历史上, 拉美和美国曾是欧洲列强的殖民地, 但从独立到 19 世纪中后期, 二者发展经济的准则和社会政治结构的差异已日趋明显。1870 年, 美国的制成品总产值已跃居世界第 2 位, 拉美则仍然是为北大西洋国家生产原料和粮秣的地区; 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治不断得到完善, 而拉美不少国家政治变动频仍, 甚至战火不断, 考迪罗横行。美国政治家和史学家福斯特曾指出, 在拉美, “.....在教会及其封建束缚的妨碍之下, 资本主义是不能自由扩展的.....因为作为大地主, 它基本上总是中世纪的和封建的。凡是天主教势力深厚的国家, 从来没有能够完成充分的工业化。”在美国, “资产阶级是强大的, 而教会却是相对地脆弱和不团结, 分裂成为许多纷争的天主教和新教宗派——这对

于年轻的美国民族的前途, 确是一桩很幸运的事。”笔者认为, 在 19 世纪的拉美和美国, 天主教和新教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为两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注入了不同的精神因素, 是造成二者社会经济差别日益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天主教: 阻碍拉美社会变革的绊脚石

从 19 世纪的欧美社会发展潮流来看, 资本主义在许多地区迅猛扩展, 封建残余渐趋消亡。拉美各国社会发展问题的轴心是扫除

——
〔美〕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 第 207~208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一切封建残余，开辟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然而，天主教会是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最大障碍之一。

但是，拉美独立革命取得胜利后，一些新生国家仍然长期奉天主教为国教。拉美教会不仅继承了伊比利亚天主教的信仰传统、基本教义及持久的虔诚性，而且继续拥有特权和财富。因此，天主教会敢于逆潮流而动，仇视并阻止一切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变革，成为与各国进步力量相对抗的另一个权力中心。对此，笔者试从以下几方面加以阐述。

第一，拉美教会仍然拥有巨额财富和封建特权，这成为它们阻碍资本主义成长的物质基础。据美国史学家伯恩斯阐述，18世纪末，在新西班牙的一些省份，天主教会控制了80%的土地。19世纪上半叶墨西哥一位著名史学家也揭露说，教会的农村地产和城市财产占全国房地产总值的一半。在此基础上，教会获得了很大的权力。教士常常参与政事，在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或者支持政治候选人；教会拥有特别司法权，甚至可以干预民事诉讼；教会几乎在所有国家垄断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很显然，在国家形成的初级阶段，教会不仅对新国家的精神生活，而且也对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事业方面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在经济方面，教会的大片土地长期闲置，大量资金成为高利贷资本而不是民族工业资本。在政治方面，教会的权力不仅损害了国家政权的完整性，而且阻碍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发展。

第二，教会为了维护其特权，不择手段地反对政教分离，要求新独立国家继续把天主教奉为国教，认为这是抵制自由主义、实证主义和其他世俗敌人的惟一防卫手段。1823年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也谴责自由主义、政教分离以及信仰自由等观念，此后，这些观点又得到教皇庇护九世的确认和充实，并作为教会的信仰准则被传播到拉美，这更坚定了拉美教会反对社会革新的立场。

第三，教士与政治上的保守派结成联盟，制造舆论，共同捍卫教会和世俗政权的专制统治。按照天主教教义，由于人有所谓的非理性，所以有必要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和实施宗教制裁。保守派还认为，如果没有宗教的束缚，人们就会躁动不安，变得无法无天。因此，保护宗教不是基于宗教的真理，而是基于宗教的效用。这样，教会和保守派就共同为寡头专制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四，罗马教廷的保守主义观点和立场为拉美天主教会反对社会革新提供了思想武器，使之有恃无恐地对付自由派。19世纪拉美天主教思想的主要来源是教皇庇护九世所提出的保守主义思想，其主要观点集中反映在《告所有教区神父的通谕》及其附录《现代错误学说汇编》中。教皇谴责自由主义、世俗主义以及对上述“错误”的容忍；他特别反对世俗教育和国立学校摆脱教会控制的主张；教皇要求各国继续保持天主教的国教地位，反对教廷与所谓近代文明和解与妥协的观点。

由于拉美教会的封建性和保守性，它同主张进行某些社会变革的自由派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甚至暴力对抗。到19世纪下半叶，由于拉美各国自由派政府通过立法等手段实行政教分离以及国内外其他因素的作用，天主教会逐渐丧失了世俗权力和特权，且对新的政治领导人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但是，各国政教之间关系的变革进度和规模不一。一些国家不仅实现了政教分离，而且还限制了教会的宗教职能；有些国家的教会仍然依附于国家，并继续得到国家的津贴；还有一些国家，教会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国教，但主教由国家任命。在少数国家，剥夺教会的财富和特权是通过长期的暴力斗争实现的，其中最典型的实例是墨西哥天主教会

〔美〕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第140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与自由派政府之间的斗争。

墨西哥教会从殖民地时代起就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在19世纪成为捍卫陈旧的社会结构和传统的特权阶级利益以及反对自由派改革计划的最重要代表。天主教会与推行改革路线的自由派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曲折而激烈的、有时甚至是残酷的流血对抗。60年代末,这场斗争以自由党人改革路线的胜利而告终,墨西哥艰难地实现了政教分离,国家征用了教会的巨额财产,废除了教会的政治特权,完成了国家的世俗化进程,为资本主义的成长创造了必要条件。

墨西哥独立后,天主教会仍然是国内一股最强大的顽固守旧势力。在社会政治方面,教会享有特别司法权,可以独立处理其内部事务,并同罗马教廷保持直接联系。此外,独立战争后新的教会领导集团同国内寡头势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经济方面,教会控制了墨西哥国家财富的1/4。据估计,1832年教会拥有资本1.8亿比索,每年收入750万比索,这笔钱款的2/3用来维持10个主教管辖区和177名大教堂教士的生活。与国家每年财政收入相比,这笔资金是巨大的,因为当时国家岁入不超过1000万比索。

1833年激进派自由党人执政后,颁布一系列废除教会封建特权的法令:废除教士阶层的司法权;在对教会财产实现世俗化的基础上,解决国债支付问题;改革公共教育制度;没收传教团的财产,对设在墨西哥境内其他传教团的财产实行国有化。此外,政府还结束了天主教会教育的垄断,关闭了圣玛丽亚教会学院和墨西哥天主教大学,将它们移交给公共教育部。国会还通过立法,废除强制征收的什一税。由此,政府每年可增收约250万比索的捐税。政府禁止组建宗教社团,民事状况登记改由国家控制。政府还通过立法,掌握了神职人员的任命权,规定各地教堂活动改由民政当局管理。司法和教会事务部长还宣布,禁止教士干预政治问题。

自由党政府的一系列宗教改革措施,极大地削弱了教会的经济基础,剥夺了教士的政治特权,逐步限制了教会对文化教育的影响。这一切引起了教会的强烈反应,一些教士公开抨击政府的改革措施,一些人则开始秘密策划反政府阴谋。自由党政府在借助一系列立法实现政教分离的同时,还打算剥夺军人司法权、缩减兵员和禁止使用雇佣兵。于是,在“宗教与司法权万岁!”口号下的反政府暴动和谋反不断发生,结果教权主义者和保守派代表掌握了政权。这样,30年代自由派的改革以失败告终。

四五十年代是自由派与教会斗争的相持阶段,国家政权几经易手。改革派自由党人为达到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目标,同教会上层领导集团、保守派将领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史称“改革战争”。以贝尼托·华雷斯为首的改革派的目标是彻底实现政教分离,征用教会财产、废除教会及军人的司法权,建立一个现代的、非宗教的社会,国家实行代议制政体和遵循民主自由原则。然而,无论是在墨西哥还是在拉美其他国家,上述政治目标很难达到,部分原因是殖民地时代就不存在代议制机构,甚至殖民地时期上层寡头阶级实际上也缺少各种社会政治权利。在宗主国西班牙,上层阶级仅可利用具有有限民主的议会和市政会,而在美洲殖民地唯一可资利用的是市议会,但该形式只是到1790年后才出现。因此,殖民地上层阶级可利用的工具是教会和军队,这就是墨西哥教会与军队在1821年独立后比在1810年前更为强大的原因。所以,自由党人为了最终消灭殖民地残余势力和扫清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不得不剥夺这两大保守势力的特权。因此,自由派与教会的冲突应置于资产阶级与寡头势力之间矛盾的框架内加以分析。

[苏联]J. 格里古列维奇:《天主教会与拉丁美洲解放运动》(西班牙文版),第190页,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84。

改革派自由党人认为教会惟一所要考虑的是“精神问题”，它不应享有特权，手中不应集中物质财富。1855年著名的华雷斯法剥夺了教会与军人法庭审理民事诉讼的权利，同时也剥夺了教士的选举权。随后，自由党政府又颁布了莱多法，宣布废除教会所有制。政府解释颁布该法的理由是，“国家繁荣和扩展道路上最大的障碍之一是社会资源的基础——大部分不动产处于自由流通领域之外”。莱多法还废止了教会另一种极为重要的金融机构“遗嘱仪式与敬神功绩评判团”，因为它曾经垄断了墨西哥所有的信贷体系。根据莱多法，政府出售被征用的教会产业获得了2300万比索，并由此产生了9000个新业主。墨西哥史学家认为，华雷斯法和莱多法是国家独立史上最重要和最大胆的决定。

1857年2月5日通过的墨西哥宪法集中表达了这场改革的内容，它宣布墨西哥为“代议制、民主和联邦共和国，由内部政体自由和主权之各州组成”。宪法包括华雷斯法和莱多法的基本规定，其中第27条最为重要：禁止教会和世俗社团拥有或支配不动产，但宗教建筑物除外。教士在选举中有投票权，但无权当选总统和议员。

1860~1867年是自由派与教会的决战阶段。作为对改革的回答，教士宣布对改革派自由党人进行一场“圣战”。保守派与教士结盟的“政府”宣布，废除过去反教会的一切立法，废除1857年宪法，恢复教会与军人司法权，下令将已出售的资产归还教会。当教士及其盟友濒临彻底失败之时，他们谋求在欧洲王室的庇护下建立君主制。以华雷斯为首的改革派经过数年浴血奋战，最终打败了法国干涉军及教士和寡头的军队，捍卫了改革成果。1861~1866年，政府征用了总额达6200万比索的教会财产，举行了约4万次教会财产的拍卖活动。这大大削弱了教会的经济实力，但最终得益的不仅是政府，而且还有小业主以及购置教会产业的资产阶

级。改革战争不仅创建了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而且也造就了一支新资产阶级队伍。

墨西哥教会与自由派政府之间尖锐而长期的斗争，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拉美国家为什么不能像美国那样顺利地推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其原因之一在于，“大部分新独立国家所特有的长期政治动荡没有为经济发展提供适当环境。占用新独立国家主要注意力和精力的是政治活动而不是经济活动。”实质上，各国自由派政府对教会进行的斗争是19世纪拉美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的一部分，特别是像在墨西哥这样的国家为实现政教分离、废除教会特权和征用其财产而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无疑这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发展。

拉美国家正是在经历了政教斗争之后，到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因素才明显增长。如在墨西哥，以华雷斯为首的自由派战胜教会后，造就了一批新资产阶级。莱多法废止“遗嘱仪式与敬神功绩评判团”不久，墨西哥便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银行，其中第一家是英资伦敦与墨西哥银行（创建于1864年）。由此看来，教会封建特权及其巨额财富的被剥夺，确实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

新教：近代美国社会变革的精神动力

在美国，从殖民地时代起，教派林立的新教就始终处于无权力、无特权和无财富状态，它没有必要像拉美天主教会那样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因循守旧。新教不断适应客观现实，参与和推动社会变革，在社会思想领域长期保持着影响力。正如19世纪30年代初曾到美国考察民主制度的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

同书，第205页。

同书，第147页。

中所指出的：“在美国，宗教也许不像它早先在某些时期或在某些国家里那样强大，但它的影响力却更为持久。它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发生影响，但这个力量任何人也剥夺不了。”因此，19世纪的新教实际上成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美利坚民族迅速成长的精神动力，同时也是造成美国与拉美社会经济差异不断扩大的重要因素之一。

首先，新教的伦理道德观从殖民地时代起就是影响美利坚民族特性的重要精神因素。早期英国清教移民的节俭勤劳的人生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北美黑人，整个社会逐渐形成崇尚勤俭、进取和发展的风尚。显然，它不同于伊比利亚美洲所盛行的鄙视体力劳动、崇尚悠闲享乐的中世纪贵族式的社会传统，而是体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新兴资本主义精神。18世纪北美著名的政治家和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曾以格言的方式对此作了简洁的表达：“记住，时间就是金钱。一个人靠自己的劳动一天能挣10先令，而他却跑出去或闲呆着半天，尽管他不过花了6个便士，但也不该只算花了这些；他实际上已经花了，或不如说是扔了另外的5先令。”

其次，新教特别是加尔文宗的上帝选民思想影响着近代美国人。按照这一神学思想，“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他们有责任使美国成为“全世界的楷模”，正是这种宗教使命感激励着美国人去履行“神圣的天职”。对此，美国学者作了具体阐述：“许多19世纪的美国人，尤其是（但不完全是）那些有炽烈宗教信仰的人，认为他们国家的命运，不仅关系到他们自己，而且关系到全人类。在美国适宜的环境中，不论男女都会显露出自己管理自己的才能；会过着与上帝的宇宙万物之道协调一致的生活，会铲除社会的不平；他们将会创造一个正直男男女女的理想社会，领导这样的社会的领袖的动机将是大公无私和仁慈善良的。如实现这些崇高目标，美国将会成为全世界的楷模，否则将是对神圣

托付的背叛。”这种“神圣使命感”不仅是19世纪两次宗教奋兴运动的启动力，而且也是其表现形式。宗教奋兴运动增强了人们的宗教信仰，也激发了人们奋发向上的精神，使之投身于社会变革活动中。

18世纪中期首次出现“大觉醒”运动之后，新教奋兴运动成为一种周期性现象。每到社会转型期，就会出现宗教复兴运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美国完成了从殖民地社会向自由资本主义的转型，产生了第2次大觉醒运动（1800~1840）；南北战争结束后，又出现了第3次大觉醒运动（1880~1920）。

在第2次大觉醒运动中，新教各派纷纷以野营布道会的形式来传播自己的教义思想，使得宗教狂热从东部向西部蔓延。各地奋兴运动都强调上帝最终是充满仁爱的，救赎并非预定，一切人都有可能获得拯救，这就冲破了正统加尔文宗的预定论的束缚，从思想舆论和组织上推动社会改革的展开。奋兴运动中影响深远的至善论和千禧年主义，不仅是积极乐观、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神学思想，而且也是加尔文宗道德思想的载体。

至善论最早是由卫斯理会创始人约翰·卫斯理提出的。他认为，人的得救虽需凭借神恩，但也取决于个人的自由选择，每个人都有得救的可能。这一理论影响很广，且成为奋兴派思想的一部分。后来，美国“近代宗教精神复兴之父”查尔斯·G·芬尼摒弃了正统加尔文宗的预定论，把得救与达到至善的主动权从上帝那里转移到了个人手中，从而激励人们投身于对世界的改造，以消除战争、奴隶制以及一切恶行和弊病。改革家们认为，至善论的目标是能够顺利实现的，牧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册），第3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转引自张志刚：《走向神圣》，第2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美]J. 布卢姆等著：《美国的历程》（上册），第40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师的职责不仅是传播福音，而且应该推进改革事业，帮助实现美国的社会理想。

早在殖民地时代就已出现千禧年主义，到19世纪，这一理论在奋兴运动中得到广泛传播。千禧年主义者认为，对美国进行重新改造，正是期待基督复临和《新约全书·启示录》中提到的神圣太平盛世一千年到来的神圣计划的组成部分。在其影响下，不仅福音派牧师和信徒，而且改革家们都相信千禧年将会到来，而为了迎接这个理想的社会，人们就必须消弭目前社会的一切罪恶。

由此看来，至善论和千禧年主义又是新教牧师倡导改革的思想武器。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启动，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面对这一现实，新教改革者借助宗教奋兴运动激发人们的宗教热情，同时又利用至善论和千禧年主义的思想感召力，促成成千上万的教徒投身于社会改革运动，借此树立新教的社会道德风尚。这样，新教各派实际上成为社会改革的倡导者，它们在慈善事业、禁酒运动、女权运动、教育改革和反对奴隶制运动等方面都产生了影响。

在宗教使命感的驱动下，为了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新教的一些志愿协会在城市中建立了传教团，定期走访居民，后又成立防止贫穷协会，推动教会对贫民的慈善事业。教会慈善家还提出较为开明的罪犯教育方法，主张对罪犯要以改造为主。此外，在奋兴运动中许多妇女皈依了福音新教，这意味着妇女成为独立的主体，开始摆脱对男子的依附地位。还有一些妇女担任巡回福音传道者，主持布道工作，这有利于妇女的觉醒，促使她们投身于社会活动。

19世纪早期，教育事业十分滞后，城乡人民大众仍处于半文盲状态。教会认为，教育的普及不仅是进行精神和道德指导的一种手段，而且也是实现新教理想的一个部分。因此，新教各教派都很重视发展教育事业。教会对大学的教育也进行了一些改革，让妇女

和黑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有些教会还设立主日学校，让儿童接受基本宗教教育。这一办学形式逐渐成为各教派间向社会普及宗教知识的手段。主日学校除传播新教思想外，还对学生进行阅读、写作等基本知识的教育，为普及教育作出了贡献。1850年，新教主日学校的学生已超过50万人。

19世纪初，新教各派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出发，普遍反对奴隶制。不少牧师认为，奴隶制在道德上是一种罪恶和堕落，阻碍了人类达到至善境界，也延迟了千禧年的到来。1818年长老宗总会议的一份声明就公开谴责了奴隶制：“一个人类种族强迫奴役另一种族明显违背了人类本性中最珍贵和最神圣的权利，完全违反了上帝的法则——要求我们爱邻居如同爱自己一样；此外，它与基督福音的精神也是背道而驰的。”但是，随着工业革命和西进运动的展开，奴隶制重新活跃并成为南方种植园的基本劳动制度；同时，南北经济冲突也日益加剧。在此背景下，围绕奴隶制问题，新教各派也出现了南北分裂的局面：南方的牧师维护奴隶制，北方的许多福音派牧师反对奴隶制；而后者为最终废除奴隶制准备了精神条件。

除参与和推动社会改革外，新教各派还为19世纪美国扩展疆土积极行动。早在18世纪前期新教就通过奋兴运动催生了北美的国家主义。一些传教士从一个殖民地转移到另一个殖民地，传播新教思想。赞成信仰复兴的“新光派”认为，一个对神有兴趣的社区可以超越特定的政治边界。更重要的是，有关“国家传教团”的想法已经出现，他们认为，耶稣复临时，将把他的千禧年王国建立在美洲而不是在欧洲。同时，新教还强调同一信仰者之间的团结和北美的特殊命运。从

[美]H. S. 史密斯等著：《美国基督教：以代表性文件阐述历史》第2卷，1820~1920年，第179页，纽约，1963。

这一意义上讲,“大觉醒帮助了那些最后促成美国革命和独立宣言的力量”。

在19世纪前期西进运动中新教各派借助第2次奋兴运动,对西部边疆地区发挥了稳定作用。边疆地区移民的生活极其艰难,社会十分混乱。当时新教各派都有数以百计的传教士在边远地区传教,牧师们做了许多维护社会秩序的工作,如把酗酒成性或道德败坏的教徒驱逐出教等。于是,教会在西部边疆成为一股文明力量,给人们规定了最起码的行为准则。后来,教会还逐步在新成立的州里筹建学校和学术机构。

宗教奋兴运动影响广泛,甚至波及异邦人民。1806年威廉斯学院的5名学生决心秘密从事海外传教事业,1810年成立了美国国外传道会会长理事会。10年后,该组织派遣传教士到夏威夷群岛,他们的作用并不局限于传教,还为78年后夏威夷划入美国版图发挥了先锋作用。关于新教各派在西进运动中的作用,托克维尔作了以下评述:“我曾看到美国人向新建的西部各州派遣神职人员,并在那里建立学校和教堂,还自动建立起各种团体。他们担心宗教在西部各州的森林里消失,害怕迁到那里的人不会像在原籍时那样享得自由。我曾遇到一些新英格兰的居民离开故土,长途跋涉来到密苏里河两岸或伊利诺伊州的大草原上,以在这些地方为基督教和自由奠基。”¹⁰

综上所述,新教各派通过宗教奋兴运动和社会变革,不仅树立了美利坚民族的勤勉、进取和奋斗的伦理道德准则,而且为美国社会经济进步提供了精神动力。美国新教的这种积极作用,同拉美天主教会竭力阻碍社会变革的绊脚石作用形成了强烈对照。19世纪末,在新教的精神力量驱动及其他各种内外因素作用下,美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

结束语

近代拉美天主教与美国新教的教义理论

和实践的差异性,不仅是美洲不同地区现实社会经济发展逻辑的产物,而且有其久远的历史根源。

众所周知,16世纪作为欧洲封建制度基本组成部分的天主教移植到拉美后,成为享有政治特权和拥有巨额财富的国教,并为那里的殖民地模式——社会等级制、政治专制主义和单一产品制经济结构提供了思想和物质基础,而且成为伊比利亚殖民者和移民的精神因素。而17世纪作为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思想武器的基督教新教,因受到英国王权和国教会的迫害,其大批教徒逃亡北美洲,希冀在北美的荒原上建立起“一个崭新的、沐浴上帝恩泽的天堂”。经过长期而艰辛的努力,新教为北美的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社会、不断完善的民主政治和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柱。

应该说,独立后的美国和拉美国家的许多社会政治特点是殖民地时代特点的延续。正如美国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所指出的,“美国在独立之后基本维持着独立之前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也完全适应其社会需要。拉丁美洲国家在赢得独立之际,继续并维持了一个实质上是封建的社会结构。”¹¹19世纪的拉美和美国的现实为天主教和新教继续发挥其传统的社会功能都提供了类似于殖民地时代的环境条件。在现实条件下,拉美天主教会仍然保持着它的封建性和保守性,成为对抗一切社会经济变革的核心力量,是社会发展的巨大阻力;而美国新教各教派则仍然保持着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奋发向上、不断进取的特点,成为美国社会迅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责任编辑:刘维广)

10 同书,第340页。

11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123页,北京,三联书店,1996。